

中共菁英政治研究與質性資料分析¹

寇健文

政大政治系助理教授

摘要：本文的目的在於闡述如何整理、分析中共公布的官方文件、新聞媒體對領導人講話與活動的報導、照片與影片鏡頭等質性資料，以便找出隱藏在這些事件中的線索。本文認為，若能以較長的時段歸納中共領導人對不同特定議題的發言內容，以及活動狀況，就能幫助研究者掌握中共高層內部是否出現分歧。更重要的是，掌握這種分歧屬於個別的政策歧見，還是屬於涵蓋範圍較廣的分歧。所得結果再對照中共菁英政治的總體發展趨勢，更能彰顯特定時間內高層互動的意義與可能影響。

關鍵詞：中共、菁英政治、質性資料分析

綱目：

壹、前言

貳、中共新聞媒體的政治性與宣傳角色

參、少量文字資料的解讀

肆、少量非文字資料的解讀

伍、大量短期資料的編碼

陸、宏觀理論與長期性資料分析

柒、結論

壹、前言

高層互動是研究中共政情發展的基礎知識。然而，由於中共高層互動仍屬於黑箱作業，外界很難充分掌握所需的資訊。舉例來說，2004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前夕，外界對於江澤民是否會辭去軍委主席的看法相當分歧。有的報導說他將會在四中全會上辭去軍委主席，由胡錦濤接任；有的報導則說他不會在四中全會上辭職，而會等到五中全會。有的報導說江澤民已經有儘快交棒的心理準備；有的則說他會正面迎戰逼退的壓力。² 在這種「資訊不完整」情形下，研究者如何有效利用極為有限的資料，比較正確地判斷中共高層互動的情形？

早期台灣的中共研究專家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當傑出，經常能準確的掌握

¹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93-2414-H-004-010 的部分研究成果。

² 分歧的看法可從外界媒體報導中看出。參見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04, p. 1；**中國時報**，2004年9月3日，第A9版；**聯合報**，2004年9月8日，第A13版；*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2004, p. 1；**中國時報**，2004年9月9日，第A13版；**聯合報**，2004年9月9日，第A13版；**聯合報**，2004年9月11日，第A13版；**中國時報**，2004年9月17日，第A13版。

對中共人物更迭、政局變化，而為國際上的專家重視。³ 他們精確掌握中共局勢的原因，除了敵後情報的貢獻、文化語言背景的相似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個人的特殊歷史經驗。在他們之中，有的人早期曾是中共黨員，親身參與重要的黨內事件，熟悉中共內部運作與思維，甚至曾與中共領導人朝夕相處；有的人則是長期和中共進行鬥爭，累積豐富的實務經歷。⁴ 隨著學界的世代交替，當今台灣學者缺少這種特殊的個人歷史經驗，因而喪失在國際中國研究領域立足的一大特色。⁵ 既然如此，現在的台灣學者必須有系統地使用社會科學方法，分析中共已公開的資料，以降低此一缺陷帶來的影響。同時，隨著中國研究從「敵情分析」轉變為「學術研究」，中共高層互動的分析也不能自外於這個發展趨勢研究，必須更符合一般社會科學的研究標準。

本文的目的在於闡述如何整理、分析中共公布的官方文件、新聞媒體對領導人講話與活動的報導、照片與影片鏡頭等質性資料，以便找出隱藏在這些事件中的線索。本文認為，若能以較長的時段歸納中共領導人對不同特定議題的發言內容，以及活動狀況，就能幫助研究者掌握中共高層內部是否出現分歧。更重要的是，掌握這種分歧屬於個別的政策歧見，還是屬於涵蓋範圍較廣的分歧。所得結果再對照中共菁英政治的總體發展趨勢，更能彰顯特定時間內高層互動的意義與可能影響。當然，這種方法有其先天的限制。由於僅依賴公開報導，研判的結果很難做到「點預測」（如江澤民辭去軍委主席），頂多做到「區間預測」（如局勢對胡錦濤有利，對江澤民不利）。若中共官方媒體沒有大量報導領導人的活動，有限的資料將使研判的誤差範圍會增加。

本文主要分成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說明新聞媒體在中共體制中的政治角色。由於媒體是黨的宣傳工具，它刊登的文字或是非文字新聞、版面安排都必須配合黨的路線與政策。第二個部分至第三個部分以實例說明如何利用官方文件、領導人的講話和活動報導、照片與影片鏡頭分析中共高層互動。第二個部分、第三個部分分別偏重個別或少量文字性資料、非文字性資料的解讀，第四個部分則探討大量短期資料的編碼解讀。透過這個作法，研究者可以觀察中共領導人在各特定議題上是否出現歧見、是否出現多數意見，同時可以個別領導人的立場在較長的時間內是否保持一致，或是出現變化。第五個部分指出研判短期現象的先天性缺陷，並指出研究者可以根據長期性資料，建立一套中共菁英政治演變的宏觀理論，降低短期性資料先天性缺陷造成的研究障礙。

³ Tai-Chun Kuo and Ramon Hawley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p. 40. 已退休的政大國關中心第三所所長張虎也曾經告訴筆者，過去美國學者經常向郭華倫等政大國關中心早期研究人員請教問題。

⁴ 楊開煌，**中共「文件」詮釋之方法學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年12月）頁158-162。另可參見郭華倫在「中國大陸問題的研究方法」座談會中的發言。該座談會由**時報雜誌**主辦，並刊登於該雜誌第135期（1982年7月），轉載於郭華倫，**中共問題論集**，增訂版（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2年），頁415。

⁵ 郭華倫在前述座談會中便已指出這個隱憂。見郭華倫，**中共問題論集**，增訂版，頁415-416。

貳、中共新聞媒體的政治性與宣傳角色

總體來說，中共高層互動情形的綜合整理包含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兩項工作。對早期的台灣研究者來說，前者主要包括外界現有的資料、情報人員蒐集的第一手資料、逃離大陸的民眾或幹部的訪談成果、中共報刊和電台廣播等公開之文書資料、訪問大陸人員的個人觀察。進行資料分析時，研究者依據個人獨特的歷史經驗，將所獲得的資料去偽存真、剔除誇大之處，相互參照比對不同來源的資料，進而得出觀察結論。⁶

然而，現今台灣學者的個人經驗與所處的學術環境均不同於早期前輩，因此研究的方法、策略也必須有所調整。隨著「學術研究」與「敵情分析」的逐漸區隔，學術界所能依賴的資料來源是以公開取得為主，情報資料在學術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經逐漸淡化。同時，現今學術生態鼓勵學者發表研究成果，學者在發表成果時必須交代資料來源。這也使得學者不易運用機密的情報資料。其次，當今台灣學者已經無熟識中共高層，甚至曾與他們朝夕相處的特殊經驗，無法藉由個人經驗判斷資料可靠性與高層互動的變化。

在這種情形下，研究者更需要直接從中共公布的資訊中，找出隱藏其中的線索，以便與外界報導相互對照、驗證。中共高層互動的（第一手）資料來源大致可以分為訪談、官方文件、活動報導、影片與照片、歷史傳記與回憶錄等幾種管道。在這幾種資料來源中，又以官方媒體發布的官方文件（含會議決議）、活動報導、照片（含影片）為主，訪談、歷史傳記與回憶錄為輔。

當今的中國研究中已經大量採用訪談（或深度訪談）蒐集資料，但中共菁英政治研究使用訪談的機會不多。由於政治敏感度較高，研究者很難親自訪談中共高級幹部。與大陸學者交換經驗可以獲得啓法，卻不一定能獲得精確而有證據的資料。這是因為研究者不一定知道大陸學者透露的訊息是全部事實，或是只是他們旁觀的心得。⁷ 有時基於人身安全因素，無法將透露消息者直接寫出來。這些情形都妨礙研究者利用訪談研究中共高層互動。同時，雖然訪談成果可能非常有價值，但是無法以長期、大量訪談累積中共高層互動的第一手資料。這些限制使得訪談不易成為研究中共高層互動的主要資料來源。歷史傳記與回憶錄是從龐雜的內容中找到有用的資料，但未必有助於分析即時性的中共高層互動，反而比較適合歷史性研究。⁸

⁶ 郭華倫，「關於研究『中國大陸問題』之方法」，見郭華倫，**中共問題論集**，增訂版，頁 391。該文原為作者提交 1972 年 6 月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之第二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的研討提綱。

⁷ 2002 年 9 月筆者曾就領導人 70 歲劃線離退之決議請教兩位中共中央黨校學者。他們說「中共會針對個別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做出一些特別規範，但這些規範未必拘束下一次大會。」這是極少數具有啓發性，又可以公開的訊息。

⁸ 舉例來說，前中紀委委員李惠仁在回憶錄中指出，挑選第十五屆中委的具體要求「中央委員要老、中、青結合，55 歲以下的要佔 50% 以上。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原來的中央委員中，滿 65 歲的正省、部級幹部和滿 60 歲的副省、部級幹部，不再提名，新提名的，不得超過 62 歲。」李惠仁，**滄桑流年**（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2 年），頁 415。雖然這個要求在 1997 年就已經出現，但筆者要到 2002 年才找到出自中共高幹筆下的直接證據。

相反的，官方文件、活動報導、影片與照片是從中共官方新聞媒體中取得，可以清楚說明資料來源，無需考慮保密問題。同時，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新聞社等中共主要新聞媒體成立甚早，研究者可以長期累積大量的資料，以便追蹤、比較領導人互動的變化。⁹ 基於這些原因，本文的討論重點將集中在前三種資料來源。

在討論官方文件、活動報導、影片與照片等三大資料管道之前，必須先了解新聞媒體在中共政權中的角色。在中共政治運作中，新聞媒體是黨的宣傳與輿論工具。大陸學者甘惜分認為，新聞不僅是敘述新近發生的事實，而且隱含新聞發布者對此一事實的評價。這種評價有時外加於事實陳述之外，有時卻隱藏於事實陳述之中。當讀者閱讀或收聽新聞後，不但知道新發生的事件，也不知不覺受到媒體立場的影響。¹⁰ 更重要的是，對中共來說，新聞媒體是特定政黨或政治集團的輿論工具，亦即媒體具有「黨性原則」，因此新聞存在政治傾向。¹¹ 大陸學者戴邦、錢辛波、盧忠民認為，「[選稿]有兩條根本的取舍標準；一條是政治價值標準，一條是新聞價值標準。所謂政治價值標準，就是要看稿件所報導的事實，宣傳的思想傾向，是否符合本報的辦報宗旨，也即報紙代表的階級、階層、黨派的利益（包括路線、方針、政策）；所謂新聞價值標準，就是要看報導事實的重要性、新鮮性、時宜性和趣味性。」¹² 既然新聞媒體扮演著「思想加工廠」的角色，匯集、篩選、詮釋各種最新事實，製作成爲對廣大群眾的宣傳品，¹³ 中共絕對不允許新聞媒體背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¹⁴ 因此，中共官方新聞媒體不可能有

⁹ 人民日報創刊於 1948 年 6 月，1949 年 3 月成爲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報；解放軍報創刊於 1956 年 1 月，爲中共中央軍委機關報，由總政治部主管。新華社的出現可回溯至 1931 年 11 月；中國新聞社則於 1952 年 9 月成立。見王良能、莊照欽，「大陸新聞事業」，行政院新聞局編，**大陸大眾傳播事業及管理概況**（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5 年），頁 67~68、頁 79~85。

¹⁰ 甘惜分，「什麼是新聞——關於新聞的定義」，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新聞學論集》編輯組，**新聞學論集**，第一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 年），頁 15-16。

¹¹ 甘惜分，「什麼是新聞——關於新聞的定義」，頁 16。甘惜分，**新聞論爭三十年**（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年），頁 30。邵培仁、葉亞東認爲新聞傳播有六大原則，其中第一個原則就是思想性原則。思想性原則包含「要符合黨的方針、路線和政策」。見邵培仁、葉亞東，**新聞傳播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36。王雄更直接表示大陸的媒體是國家意識型態機器的一部分，以意識型態的生產與傳播爲基本任務。由於官方意識型態是中共主張的馬列主義，它就提供媒體解釋新聞事實的基本標準。見王維，**新聞輿論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年），頁 13、頁 86~92。

¹² 戴邦、錢辛波、盧忠民主編，**新聞學基本知識講座**（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4 年）頁 398。

¹³ 甘惜分，「什麼是新聞——關於新聞的定義」，頁 22。

¹⁴ 余致浚，「論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後報紙的性質與任務」，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新聞學論集》編輯組，**新聞學論集**，第一輯，頁 1。甘惜分認爲，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黨性是「堅定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做爲觀察一切社會問題的思想武器；正確宣傳黨的路線和政策，保證政治上與黨中央的一致；在對待任何問題時，從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利益出發；與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黨的傾向做鬥爭；在組織上嚴格服從黨的領導。」見甘惜分，**新聞論爭三十年**，頁 10。戴邦、錢辛波、盧忠民就指出，「黨報是黨委的機關報，是黨委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在黨委直接領導下工作的，因而黨報必須尊重黨委的領導，必須服從黨委的領導，就是說不只是在組織上要服從，首先是在思想上要服從，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在尊重和服從黨的領導方面，報紙工作人員…絕對不容許鬧獨立性，也不許犯自由主義。」又說「黨的報刊必須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是我們黨報的傳統，也是黨報的黨性原則。」見戴邦、錢辛波、盧忠民主編，**新聞學基本知識講座**，頁 171、頁 176。關於中共控制新聞媒體的方式，見張多馬，**大陸新聞事業概**

獨立的政治傾向。

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在 1992 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媒體運作滲入市場機能，使得大陸媒體市場出現新的變化。然而，大陸的新聞改革仍然面臨市場經濟運作與官方控制之間的衝突。更重要的是，新聞媒體的「黨性原則」並未放棄。¹⁵ 「黨的領導」和「以黨報為核心」仍然是大陸新聞體制的基本原則。¹⁶ 1996 年 9 月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繼續強調「新聞宣傳必須堅持黨性原則」。¹⁷ 因此，儘管當今大陸媒體已經不同於文革時代以前，但處理政治新聞的方式並沒有明顯變化，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各省黨委機關報等官方報紙仍然遵循相同原則處理政治新聞。在這種黨與媒體的關係下，中共官方媒體公開刊的訊息必然經過審慎嚴格的篩選。無論這些訊息是以文字方式，或是以非文字方式公布（如照片、影片或漫畫）的訊息，都有其特定的政治功能與目的。¹⁸

非文字方式表達的信息除了包括照片、影片或漫畫之外，還包括「版面語言」所透露的訊息。「版面語言」是編輯者根據版面編排手段和版面空間佈局的交叉運用，表達他們的態度、立場。¹⁹ 由於報紙在中共體制下是一種輿論宣傳工具，版面編排與版面空間佈局同樣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與意圖，不能隨意編排。²⁰ 當報社對某一事件暫不宜直接發言時，「版面語言」往往是報社的特殊的發言形式，發揮文字語言所不能取代的作用。

在版面編排方面，編輯者透過標題長短、字型大小，以及稿件位置高低等手段，表現各則新聞間的輕重、主次關係。編輯者也可能運用花邊圍框、套紅等方式，說明他們重視某一事件、意見的程度。每一則新聞、評論在版面上享有的地位與待遇都體現編輯者的立場和傾向。因此，版面編排是一項專業性工作，但專業性必須為報社的政治立場服務。

此外，編輯者會利用區間優勢來表達他們的意見。一塊完整的版面空間安置稿件後，在視覺上被切割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區間。在讀者視線運動中，這些區間的優先順序並不一樣。以大陸報紙橫排版面來說，讀者通常最先注意到左上角區間，其次是右上角和左下角區間，最差的是右下角區間。優先被讀者看到的區間為優勢區間，反之則為劣勢區間。²¹ 綜合上述觀點，新聞是否被放在頭版，或者

況（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5 年 6 月），頁 11~18。

¹⁵ 丁伯銓、王雄、董秦等合著，**新聞輿論引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99~200。

¹⁶ 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對媒介角色的認知」，**傳播研究集刊**，第 6 輯（2001 年 7 月），頁 6~7。

¹⁷ 全文見**人民網**（北京），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6/20010430/456601.html>。

¹⁸ 楊開煌，**中共「文件」詮釋之方法學探討**，頁 55。

¹⁹ 除另有註釋說明外，以下三段關於版面編排手段與版面空間佈局的觀點，見戴邦、錢辛波、盧忠民主編，**新聞學基本知識講座**（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4 年），頁 395、398~399。

²⁰ 鄭興東，「試論版面語言」，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新聞學論集**》編輯組，**新聞學論集**，第一輯，頁 49。

²¹ 另一位大陸學者也提到類似的觀點——「上半版優於下半版，左區優於右區（橫排報紙），第一版優於其他版」。見鄭興東，「試論版面語言」，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新聞學論集**》編輯組，

是否放在版面的優勢空間都反映出編輯的政治立場。此政治立場又必須符合黨的路線與政策，而非編輯的個人喜好。

參、少量文字資料的解讀

基於上述各種理由，中共公布的官方文件、提交黨大的政治報告、會議記錄、法令規章、領導人講話中的用字遣詞，甚至上述文件起草過程的新聞報導都具有重要政治意義，可能顯示政策走向或是領導人地位的變化。²² 舉例來說，江澤民、胡錦濤對「三個代表」的不同說法顯示政策走向的變化和意識型態詮釋權的轉移。2002年江澤民在七·一黨慶講話中闡述「三個代表」的內涵與重要性，並暗示中共將允許私營企業家入黨，為當年年底「三個代表」寫入黨章鋪路。「三個代表」修正過去中共只代表工農等被剝削階級的利益，改以生產力為標準，將目前代表最先進生產力的非公有部門從業人員納入中共代表的範圍內。由於非公有經濟部門對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如果中共不代表這些新生社會階層的利益，將削弱中共的群眾基礎，不利於政權穩定。這個觀點顯示中共意識形態的一大轉折。

然而，「三個代表」的詮釋權很快落入胡錦濤手中。2003年胡錦濤在七·一黨慶講話中歌頌「三個代表」之後，指出「三個代表」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並要將這個觀念落實到政策中、領導幹部思想和行動中，以及關心群眾的工作中。在闡述何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時，胡錦濤談到當年3月他提出的「三個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一人為私營企業主講話，一人關心普羅大眾利益，兩人著重的焦點明顯不同。換言之，胡錦濤利用「三個代表」的大框架，把自己的觀點置於其中，強調「代表最大多數民眾的利益」。至此，「三個代表」的詮釋全落入胡錦濤手中。

又如新華社發出的2004年7月22日中共政治局會議報導指出，「…宏觀調控取得的成效還是初步的、階段性的，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有所緩解，但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宏觀調控處在關鍵時刻。全黨同志一定要充分認識搞好宏觀調控的艱巨性和複雜性，堅持落實宏觀調控的政策措施，決心不動搖，工作不放鬆，準確把握力度和節奏，保證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²³ 這顯示雖然中共內部對宏觀調控雖有異議，但胡錦濤、溫家寶的意見已經獲得多數政治局成員背書。

此外，在官方媒體報導2003年《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以及

新聞學論集，第一輯，頁54。

²² 若是主要官方媒體報導的觀點若不一致，顯示內部有分歧。舉例來說，中共領導人的重要講話和活動，均須由新華社統一發稿。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新華社並未公開報導，反而由廣州日報率先刊登鄧小平在廣東的照片。這是因為當時宣傳系統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不願報導鄧小平反擊保守派的言論。此次中央與地方媒體口徑不一，反映出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見張多馬，**大陸新聞事業概況**，頁40。

²³ 新華網（北京），2003年7月2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7/26/content_1648212.htm。

2004年起草《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的起草過程中，透露出江澤民並未扮演當年鄧小平的角色。根據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整個起草工作「始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直接領導下進行。」²⁴ 胡錦濤更曾多次對該《決定》的總體思路、基本框架、重點要點等下達指示。起草小組上報的各次草稿，他都「逐字逐句地認真審閱，提出了許多指導性意見，並作了許多重要修改。」新華社敘述胡錦濤的角色時，其用語和過去大陸官方媒體、學者陳述十五大、十六大報告的說法非常類似。²⁵ 同樣的，新華社在報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和《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的起草過程時，也使用類似的用詞，凸顯胡錦濤與現任領導班子的決策地位。²⁶ 由此可見，2002年十六大至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之間，儘管當時江澤民仍然擔任軍委主席，胡錦濤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遠高過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江澤民。

除了官方文件能顯示中共政策走向與高層互動之外，官方新聞媒體對於領導人活動報導，或是評論員文章也能顯示重要政治意涵。經過側面解讀之後，這些報導可以顯示政策變化與領導人互動關係。舉例來說，退休領導人參加活動的排名順序顯示他們在黨內的地位。原毛澤東秘書葉子龍於2003年3月逝世後，中國新聞網報導胡錦濤、江澤民、溫家寶、曾慶紅、王兆國、吳儀、周永康、賀國強、王剛、李鵬、萬里、朱鎔基、宋平、尉健行、李嵐清、薄一波、宋任窮、何魯麗、傅鐵山、賈春旺、劉延東、段君毅、廖漢生、王芳、劉復之、張震等送花圈致意。²⁷ 其中可以看出，除江澤民當時仍為現職一級黨和國家領導人（軍委主席）之外，卸任一級領導人（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等等）排在現任政治局委員（二級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後。這顯示退休領導人的政治待遇已經比較有規範，不能高於政治局委員。明年三月兩會江澤民辭去國家軍委主席之後，外界可以觀

²⁴ 新華社記者曾詳細報導該《決定》起草的過程。本段引述的內容皆來自**新華網**（北京），2002年11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1/09/content_1168237.htm。

²⁵ 同時，新華社報導時也沒有提到江澤民在起草過程中的角色。該《決定》起草的過程與十五大、十六大政治報告的差別在於前者敘述其他政治局常委的貢獻，後者則完全沒有提到。新華社報導提到，「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幹等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對《決定》的形成作出重要貢獻。」同前註。

²⁶ 新華社描述第一個《決定》時指出，「《決定》的起草，始終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進行。」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先後開會討論該《決定》草稿，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見。胡錦濤曾對「對《決定》的總體思路、重點要點等作出指示。」見**新華網**（北京），2004年2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2/29/content_1337186.htm。新華社描述第二個《決定》時也指出，「《決定》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進行」，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先後數次開會討論草稿。胡錦濤「多次對文件的指導思想、主要內容、基本框架以及起草工作方式等作出重要指示」，並且「逐字逐句地認真審閱，提出指導性意見，並作出重要修改。」見**新華網**（北京），2004年9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9/27/content_2029230.htm。部分外界觀察家也指出，十六屆政治局並未做出任何形式的決定，重大事務必須先請示江澤民的意見，也從未向江澤民做過正式或是非正式的匯報。十六屆一中全會以來的政治局會議、十六屆二中全會以來的政治局常委會議，江澤民都未參加。同時，十六屆二中全會以來的重要黨政人事任免、重大腐敗案件的曝光都是胡錦濤親自主導，政治局獨立做出的決定。見宗海仁，「胡錦濤、江澤民的互動與權力消長」，**中國戰略**（美國），第二期（2004年4月），頁7。

²⁷ <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03-25/26/286972.html>

察他的參加官式活動的排名是否出現變化，進而評估他在黨內的地位。

此外，評論性文章也可以顯示中共內部的政治風向。2004年7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署名「任仲平」文章，強調當前是一個「關鍵時期」，「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陶醉於已有的成績而稍有懈怠，沒有任何理由固步自封而止步不前，沒有任何理由滿足現狀而不思進取。」²⁸「任仲平」是人民日報評論部的一個集體寫作組，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係該寫作組成員之一，²⁹其諧音讓人覺得有「任由眾人評論」之意。³⁰人民日報是中共黨中央的機關報，評論文章是代表中央的重要意見。在中共內部對宏觀調控政策出現歧見之際，人民日報刊登此一評論文章，自然有凸顯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立場。³¹

肆、少量非文字資料的解讀

除了以文字方式呈現的訊息之外，以非文字方式呈現的訊息也非常重要，如照片、電視畫面，以及報紙版面語言。就像新聞文字一樣，新聞攝影也必須考量政治因素。大陸學者蕭緒珊指出，「…新聞攝影既然是黨的有利的宣傳武器，它就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因此，攝影記者必須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從黨的長遠利益與當時的宣傳需要出發，去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記者在選擇事實時，決定拍什麼，怎麼拍，都要考慮到政治效果。」³²許必華等人也指出，「新聞攝影從業人員對於報導事實的選擇、對報導手法的運用，都受制於背後一種巨大的力量。這就是列寧所說的黨性。」³³在這種情形下，照片是否出現變造、照片中人物的排列位置、領導人出場順序的鏡頭都提供研究者觀察領導人互動關係的線索。

在文革時期，四人幫經常依據「政治需要」竄改照片，甚至刻意佈置背景拍攝照片，致使新聞攝影經常在各種「政治需要」的藉口下遭到變造。³⁴即使在文革結束以後，仍有變造照片的例子。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四人幫垮台以後，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四人被從一張中共領導人在毛澤東悼念大會上的合照

²⁸ 任仲平，「再幹一個二十年——論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人民日報**（北京），2004年7月12日，第1版。

²⁹ 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米博華表示，「任仲平」是該報評論部的一個寫作組，而他是成員之一。該部負責人民日報重大社論，包括撰寫評論員文章，還編輯兩個人民日報名牌論壇。見米博華在強國論壇的談話，**人民網**（北京），<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2313/32330/2655441.html>。

³⁰ 在官方新聞媒體中，經常看到以諧音字做為作者的假名。2004年11月15日《解放日報》刊登以「吉方平」為名的文章——「透過表像看實質——析『公共知識份子』論」。這篇文章批評「公共知識份子應該具有獨立性、批判性，不屬於任何集團和階級」的觀點。網路上有人認為「吉方平」應該是「解放日報評論」的諧音，代表宣傳部門的立場。東方碩，「黨報批評『公共知識份子』概念」，2004年12月2日，百靈社區，<http://news.beelink.com.cn/20041202/1737193.shtml>。

³¹ 關於人民日報評論文章的功能與角色，見何川，**中共新聞制度剖析**（台北：正中書局，1994年），頁74~76。

³² 蕭緒珊，「談新聞攝影的真實性」，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新聞學論集》編輯組，**新聞學論集**，第一輯，頁72-73。

³³ 許必華、葛新德、胡穎編，**新聞攝影學概論**（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頁20。

³⁴ 蕭緒珊，「談新聞攝影的真實性」，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新聞學論集》編輯組，**新聞學論集**，第一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70；戴邦、錢辛波、盧忠民主編，**新聞學基本知識講座**（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4年），頁284。

中刪除。³⁵ 四人幫被從照片中移除代表著他們與其他領導人之間權力關係的變化。

類似變造照片的情形也在 2004 年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出現。2004 年 8 月 11 日香港文匯報刊登一張背景全黑，鄧小平在鄧楠陪同下與胡錦濤握手的照片。照片的說明文字寫著「鄧小平百年誕辰展覽中有一張鄧小平與胡錦濤的單獨合影…。鄧楠介紹說，籌備鄧小平畫冊時，家人一直在找這張照片，但怎麼都沒找到。後來我們就問錦濤，你那？有沒有。果然，錦濤同志珍藏著原版，主動將這張照片捐獻出來。」2004 年 8 月 16 日瞭望東方週刊刊登一張由新華社提供的照片，鄧小平、胡錦濤、鄧楠三人位置、表情不變，背景模糊地顯示是許多人坐在階梯式的大禮堂座位上。³⁶ 2004 年 8 月 19 日新華社又發布一張類似照片。鄧小平、胡錦濤、鄧楠三人位置、表情不變，背景雖還是許多人坐在階梯式的大禮堂座位上，但眾人與鄧、胡之間卻多了江澤民、喬石等多位領導人，顯示當時這張照片為 1992 年 10 月十四大時拍攝。

這三張不同版本雖然沒有「江澤民失勢垮台」的意涵，但確實顯示高層內部的詭異關係。變造照片的出現應是有人想凸顯胡錦濤和鄧小平的關係，竟然違背大陸新聞攝影學中的「真實性」原則。³⁷ 然而，當鄧楠在香港文匯報講出第一張照片是胡錦濤珍藏的「原版」照片後，瞭望東方、新華社卻先後刊登第二張與第三張照片，間接暗示第一張照片被變造過。由於前後出現三個版本的照片，單純出於編輯疏忽的可能性極低。這最起碼顯示有人要「澄清事實」，不願「將錯就錯」，反映胡錦濤的權力並未達到「強人」的地位。

領導人的權力大小也可以從照片、電視鏡頭中人物的排列位置、官式活動的入場順序找到線索。1989 年 6 月 25 日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人民日報刊出一張楊尚昆與政治局常委的合照。由於黨內職務較低的楊尚昆（當時黨內身分為政治局委員、軍委第一副主席）站在中間，職務較高的江澤民（新任總書記）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卻分站兩側，顯見這張照片並不是按照「職務慣例」拍攝——職務高者居中、職務低者站兩側。這顯示楊尚昆在 1989 年六四事件後扮演「攝政王」角色。

人民日報報導每一次黨大時使用的「版面語言」也透露出領導人地位的線索。2002 年十六大結束次日，人民日報頭版下方的列出江澤民與九位新任政治局常委的人頭照。江澤民、胡錦濤的照片被放在第一列，但已經辭去政治局常委的江澤民在前（左側），新任胡錦濤在後（右側），其餘八位政治局常委分別置於第二列與第三列。這個排法與 1987 年十三大之後，《人民日報》處理趙紫陽、鄧小平、陳雲三人人頭照的方式不同。當時人民日報頭版下方將總書記趙紫陽的人頭

³⁵ 蕭緒珊，「談新聞攝影的真實性」，頁 72~73。

³⁶ 瞭望東方週刊是新華通訊社主管、瞭望週刊社主辦、瞭望東方傳媒有限公司出品的刊物。見該週刊於 2003 年 12 月 8 日發出的版權聲明，<http://news.sina.com.cn/c/2003-12-08/11012315120.shtml>。

³⁷ 新聞攝影的「真實性」原則是指攝影本身就是紀實，因此記者可以選擇攝影的題材、角度等等，但新聞攝影的內容必須是客觀存在的，不能製造假照片。見劉雲萊編著，**新聞攝影概論**（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 年）頁 61~62；許必華、葛新德、胡穎編，**新聞攝影學概論**，頁 67~68。當然，精心設計的真實照片也可以給人錯誤的印象。

照放在第一列的第一位（最左側），具有實權但不具政治局常委身份的鄧小平、陳雲分排第一列的第二位（中間）、第三位（最右側），其餘政治局常委的照片放在第二列。十三大領導人人頭照的排法合乎職務倫理的慣例，總書記排在第一位（但當時總書記未必權力最大）。相對之下，十六大領導人人頭照的排法不是按照黨內職務高的順序處理，顯示微妙的領導人關係。

另一個線索來源是官方電視台如何處理領導人出席重要官式活動順序的鏡頭。舉例來說，2004年3月兩會舉行時，大陸中央電視台轉播的畫面顯示，江澤民首先出場，胡錦濤跟在後面入場。然而，2004年8月22日中央電視台轉播鄧小平百歲紀念大會時，處理新舊領導人入場的方式卻不同於過去。當中共領導人依序上台之際，電視畫面停在人民大會堂的天花板，或者是遠距離鏡頭，根本看不出領導人的出場順序。大會進行時，主要畫面在胡錦濤談話，間歇帶到江澤民。

38

此外，領導人的照片是合照或是獨照也有不同的政治意義。這是因為在中共官方媒體刊登的政治新聞中，「報上照片大小，不是按新聞價值決定，而是按人物的官位來決定。」³⁹ 舉例來說，學者楊開煌統計1982年人民日報新聞照片後發現，刊登鄧小平獨照（或是照片中居於正面、清楚的位置）的次數最多，胡耀邦、趙紫陽分居二、三。因此，他認為領導人在照片中的位置反映其權力大小的變化與政治待遇。⁴⁰

若以每次黨大選出新一屆領導人之後的人民日報頭版右上角的照片為例，筆者也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1987年十三大結束後，人民日報刊登的是趙紫陽等五位政治局常委集體端坐台前開會的遠距離照片，照片中五位領導人的輪廓不清。此後，輪廓模糊的領導人照片不再出現於黨大結束後的人民日報頭版。1992年十四大後，鄧小平向人揮手的特寫照片置於頭版的右上角，正下方則為鄧小平居中，江澤民與鄧楠分站兩側的合照。1997年十五大結束後，人民日報頭版右上角的照片則為江澤民一人獨照。2002年十六大結束之後，相同位置則刊登江澤民與胡錦濤的合照。按照前述版面「區間優勢」的觀點，當屬於第一優勢區間的版面左上角均刊登新一屆中共中央人事名單之後，剩下來最具優勢的區間正是右上角的位置。由此可見，人民日報有意凸顯這幾位領導人的角色。

這幾張照片也確實反映出當時這些領導人的權力大小。1992年十四大結束之際，鄧小平已力挫陳雲等保守派勢力，重新掌握國家發展方向的決定權。十四大政治報告的主軸就是以其南巡講話為基調擬定。⁴¹ 再加上鄧小平年事已高，十四大可能是他主導的最後一次黨大。因此，鄧小平的照片被凸顯出來。一方面顯示他已經擺脫保守派的糾纏，繼續推進經濟改革，另一方面有揮手告別政壇之意。

³⁸ 聯合報，2004年8月23日，第A13版。

³⁹ 王良能、莊照欽，「大陸新聞事業」，頁45。

⁴⁰ 楊開煌，中共「文件」詮釋之方法學探討，頁82。

⁴¹ 張樹軍、齊生主編，中國共產黨八十年重大會議實錄（下冊）（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49~1056；陳麗華、周維強、王久高，中共歷次代表大會寫真（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644。

十五大結束時，中共已完成第二代與第三代之間的新老交替，無人能威脅江澤民的總書記地位。此時人民日報在右上角刊登的江澤民個人獨照正好反映出他當時的地位。十六大後人民日報刊登的江澤民、胡錦濤的合照也顯示兩人的權力關係。胡錦濤雖然接任總書記，但江澤民尚未全退，影響力仍大。因此，當時中共高層出現「兩個中心」的現象。⁴² 胡、江兩人的合照正好反映出「兩個中心」的現象。

此外，以 2004 年 7 月底至 9 月之間解放軍報頭版照片也透露江、胡兩人地位的線索。2004 年 7 月 27 日解放軍報頭版頭條新聞報導江澤民、胡錦濤參加全軍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經驗交流會代表，該則新聞在標題下方放置兩張照片。左側為江澤民獨照照片。右側則為江、胡兩人與其他軍方代表合照，江澤民位居合照第一排正中間的位置。該則照片的文字說明為「7 月 26 日，中央軍委江澤民、中央軍委副主席胡錦濤在經會見出席全軍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經驗交流會代表。…」很明顯的，這段文字凸顯江澤民居於上位（頭銜為軍委主席），胡錦濤居於次位（頭銜只有軍委副主席，沒有提到總書記與國家主席）。有江澤民的獨照，卻沒有胡錦濤獨照也顯示解放軍報凸出前者的意圖。

2004 年 9 月 1 日解放軍報頭版頭條報導江澤民、胡錦濤參觀中國核事業 50 年展覽時，兩人照片（兩人分別位居照片中央、輪廓清晰，兩旁均有少數陪同人員）再度同時出現於解放軍報。然而，胡錦濤照片居於區間優勢較強的左上方，江澤民則位於較弱勢的右上方。兩張照片的文字說明也有所變化。胡錦濤照片的說明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來到中國人民革命軍博物館，…」。江澤民照片的說明則是「…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來到中國人民革命軍博物館，…」。此時，兩段文字凸顯胡錦濤居於上位（頭銜為總書記與國家主席，沒有提到軍委副主席），江澤民居於次位（頭銜仍為軍委主席）。9 月 3 日兩人照片再度同時出現於解放軍報頭版，同樣是胡錦濤照片在左上方，江澤民照片在右上方。對照事後發展，江澤民在 9 月 1 日提出辭職信，正好是第一次解放軍報把胡錦濤照片放在優勢空間，江澤民照片落到弱勢空間的日期。

伍、大量短期資料的編碼

前一節討論的重點是以解讀單一或少數文字或非文字方式呈現的資料，進而找出分析中共高層互動情形的線索。然而，個別或少數資料的解讀難免出現「以偏概全」、「過度解釋」的疑慮。因此，最好能同時進行期間較長的資料分析。當研究者觀察中共高層互動時，不妨蒐集領導人幾個月來對數個特定議題的發言與活動，盡量整理出個別領導人對每一個議題的立場，再綜合評估中共高層互動的情形。如此一來，研究者可以觀察中共領導人在各特定議題上是否出現歧見、是否出現多數意見，同時可以檢驗個別領導人的立場在幾個月內是否保持一致，或

⁴² 2003 年 3 月 10 日十屆人大的解放軍代表團舉行討論會時，有解放軍代表提到「一個中心叫『忠』，兩個中心串起來就是『患』」，還有軍方代表指出「兩個中心綁在一起等於麻煩。多中心等於無中心，無中心則一事無成」。多維網（美國），2003 年 3 月 15 日。此新聞原刊登於解放軍報網站上。

是出現變化。

這種做法其實與質性研究方法常常提到的「編碼」類似。在質性資料分析中，編碼的工作是將每一筆質性資料加以分類或編入類目，同時建立檢索與查詢系統，以便進行下一步的分析工作。⁴³ 在編碼之前，研究者必須先初步決定用編年體或紀事體、決定編碼單位或類別，以便日後搜尋特定模式。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研究者瀏覽每一則新聞報導的重點，以便找出做出最後決定的靈感。雖然質性資料分析既是藝術也是科學，沒有清楚明確步驟可保證成功，但編碼過程仍有原則性步驟可供利用。

基本上，編碼過程分成三個步驟：⁴⁴

1. 開放編碼：在第一次閱讀嘗試中，研究者找出主題並分配標籤，將資料濃縮成數個類別，同時尋找關鍵字、關鍵事件、主題，並且記錄下來。這個步驟將使主題與焦點從繁雜的原始資料中浮現。
2. 主軸編碼：組織概念或方向，標示關鍵概念的主軸。同時檢視最初的編碼主題是否恰當，以及是否應該新增主題。雖然繼續蒐集整理資料，但並非最重要的任務。
3. 選擇性編碼：在發展出成熟的概念與主題後，選擇性的檢驗彰顯主題的個案，進行對照分析。

舉例來說，筆者分析十六屆四中全會前夕中共領導人的互動時，先採取開放編碼步驟，大量蒐集領導人的講話內容與活動行程，特別是針對當時外界大量報導的「宏觀調控分歧」，蒐集時間涵蓋 2004 年 3 月至 9 月。⁴⁵ 由於中共已無力排眾議、拍板定案的政治強人，當時又正處於權力轉移的最後階段，資料蒐集的對象涵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所有成員共約三十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同時，由於筆者要確保每一筆資料的可靠性，資料來源限定在中共官方新聞媒體，如新華網、人民日報（人民網）、中國新聞網、解放軍報，以及部分各省黨委的機關報（如四川日報等）。外界新聞報導的內容雖然也具有參考性質，但視為輔助性資訊，防止筆者遺漏重要官方新聞報導。發現有用的外界報導之後，必定找出大陸官方媒體的報導全文，在將後者收錄為有用的資料。

根據開放編碼的經驗，筆者接著進行主軸編碼步驟。在質性研究中，蒐集資料與分析資料之間的界限比較模糊，兩者必須不斷循環運用。因此，筆者在進行主軸編碼過程中仍然不斷蒐集、更新領導人講話與活動內容。經過主軸編碼步驟後，筆者將重心從單純的「宏觀調控分歧」擴大到「解放軍學習三個代表活動」、「鄧小平百歲誕辰紀念活動」、「軍方將領對江澤民軍中地位的歧見」等幾個主要事件。

⁴³ 參見 Earl Babbie 著，邱泯科等合譯，研究方法：基礎理論與技巧（台北：雙葉書郎，2004 年），頁 485。

⁴⁴ W. Lawrence Neuman 著，朱柔弱譯，社會研究方法（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2 年），頁 792-797。

⁴⁵ 以下敘述是依據係筆者在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分析中共高層互動的方式。該研究成果見寇健文，「中國政治形勢：權力來源與菁英互動的轉型」，2004 年至 2005 年中國發展趨勢學術研討會，政大國關中心第三所主辦（台北：2004 年 12 月 2 日）。

同時，筆者挑選每一個主要事件中的關鍵詞。舉例來說，對於「宏觀調控分歧」，筆者要判別個別領導人強調貫徹此一政策，或是語多保留，強調宏觀調控的侷限性或副作用，或是根本未曾發言。對於「解放軍學習三個代表活動」與「軍方將領對江澤民軍中地位的歧見」兩個事件，筆者則觀察江、胡兩人是否發言及其發言內容。同時觀察軍方將領是否突出江澤民在軍中的個人地位，如不斷強調學習「江澤民軍隊與國防建設思想」，以及強調軍隊要聽從「江主席」的指揮；或是僅提到「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或是完全不提到江澤民、胡錦濤兩人名字。對於「鄧小平百歲誕辰紀念活動」，筆者則著重在胡錦濤在鄧小平百歲紀念大會上的講話重點、其他領導人對胡錦濤講話的回應類型（肯定胡錦濤講話、不回應胡錦濤講話，但肯定江澤民貢獻、兩面討好、不發言），以及其他相關報導，如鄧小平子女的發言與活動、⁴⁶ 廣州市政協主席陳開枝在四川日報的訪談發言。⁴⁷

接著，筆者進行選擇性編碼步驟。首先，筆者將焦點集中在上述四個主要事件，排除不相關之領導人講話與活動。其次，筆者將每一則領導人發言內容按人名與職級、時間順序、事件議題三個標準分類資料。閱讀每一則新聞之後，將每一位領導人就特定事件議題的相關發言全部複製到事先準備好的表格中，特別是他們是否提到筆者擬定的關鍵詞，並依照發言日期先後來列出來。最後，筆者得到四中全會前夕中共高層互動的：一、在宏觀調控問題上，出現高層內部、中央與地方之間爭議。目前胡溫暫居上風。⁴⁸ 二、宏觀調控議題之爭顯示上海幫未必「鐵板一塊」，賈慶林、黃菊立場甚至明顯偏向胡溫。⁴⁹ 上海幫未必能在政治局

⁴⁶ 2004年7月28日中央電視台專訪鄧小平家人，重播鄧小平1989年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信件和講話，稱頌他為推動幹部年輕化作出表率。鄧小平長女鄧林在節目中表示，鄧小平退休後，完全不看文件，目的是要全心全意做平民，也不干涉年輕一代施政。**新華網**（北京），2004年7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7/28/content_1659335_3.htm。鄧林的講話完全不符合事實。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他是以普通黨員干預中共中央的政策走向。這說明有人「以古非今」，暗批江澤民不願交棒。

⁴⁷ 2004年8月21日現任廣州市政協副主席陳開枝指出，鄧小平南巡時曾多次強調「誰反對改革開放誰都沒有好下場，你們得把他打倒！」據陳開枝的回憶，鄧小平告誡當時廣東省委書記謝非，「你們能發展多快就發展多快，別管他那一套。」「你們別給那些假馬列主義者嚇唬住，他們盡用大帽子壓人。你們查一查，我們三中全會以來新做的決定，哪一條是從馬列主義的書上抄下來的，沒有。但是，你們又查一查，我們哪一條是違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沒有。」最後，陳開枝表示，「精彩吧！這就是春天的故事。看小平南巡，要看看後面的東西，那是無字之書。」見**四川日報**（四川），2004年8月21日，<http://sichuandaily.scol.com.cn/2004/08/21/20040821637564809439.htm>。

⁴⁸ 見本文第二節的引述。

⁴⁹ 賈慶林在7月23日政治局肯定宏觀調控措施之前，曾三度強調宏觀調控的重要性（5月14至18日赴湖南考察、6月9至12日赴四川考察、7月8日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顯見他不是單純順從政治局的集體決議。同時，賈慶林兩度表示，「要全面、準確、積極地理解和貫徹中央確定的政策措施」（6月9至12日赴四川考察、7月8日在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此用語和溫家寶曾經用過的詞語完全相同，明顯是在附和溫家寶的調子。黃菊於3月底至7月23日之間，四度提到宏觀調控的重要性或成效（3月25至28日赴湖南考察、4月29日至5月2日赴江西考察、5月20日在北京國際金融論壇、6月10至13日赴內蒙考察）。其中他在7月23日以後又兩度提到各地區、各部門要統一思想，落實宏觀調控措施（7月26至29日赴青海考察、8月6至9日赴陝西考察）。黃菊前後六次觀點相近的發言顯示，他在重複溫家寶堅持宏觀調控的

壓制胡溫。三、其餘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立場不一。⁵⁰ 四、胡溫與上海幫雙方各自集結、叫陣，分歧範圍已超過政策差異。例如江澤民以解放軍活動為主軸，加強其在軍中的個人地位，並企圖奪回「三個代表」的詮釋權。⁵¹ 胡錦濤利用鄧小平百歲誕辰紀念名義，凸顯胡錦濤正統的接班地位。⁵² 政治局成員對胡錦濤在鄧小平紀念大會的講話公開表態者已接近半數。(見表一) 五、軍方高層言論口徑不一致，出現擁江和擁胡的分歧。郭伯雄、徐才厚、梁光烈比較支持江澤民，徐才厚支持江澤民最為強烈，曹剛川明顯支持胡錦濤。(見表二)

陸、宏觀理論與長期性資料分析

透過少數資料解讀、大量短期性資料的編碼，研究者可以找到許多額外的線索，以便和外界報導進行交叉對比，更精準的了解中共高層互動。然而，這種方法有其先天上的限制。首先，內容分析法只能蒐集被記錄下來、被官方新聞媒體報導的領導人發言與活動。然而，沒有動態紀錄不一定代表沒有動態。倘若沒有動態紀錄的發言或活動是影響中共高層互動的關鍵事件，將會影響到分析結果。其次，假定一位領導人未對特定事件表態，他可能是因為不支持而不表態，也可能是因為無意見或是不願對非主管的業務發言。在這種情形下，如何解讀他的未表態也是研究者面臨的高難度挑戰。再者，如果個別領導人對特定事件發言的次數過少，或是曾經發言但此後幾個月不再發言，研究者也不容易判斷他的立場是否出現變化。

由於問題在於相關資訊不完整，研究者很難完全克服這些研究瓶頸。縱使詳細蒐集、分析幾個月來在官方新聞媒體刊登的各類資料，所得結果只是在訊息不完整的情形下，對於短期現象的判斷(亦即短期趨勢)。為了彌補這個缺陷，研究者可以利用宏觀理論掌握發展走向，降低(但未必能完全消除)誤判的可能性。

立場。領導人活動行程與發言內容均來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國新聞網**、**解放軍報**，下同。

⁵⁰ 7月8日至12日羅幹在雲南視察政法工作時，曾表態肯定宏觀調控，用語較為婉轉。但由於時機在7月23日政治局肯定宏觀調控措施之前，因此可將羅幹視為偏向胡溫的立場。李長春在6月10日至15日江蘇考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時，曾表態支持宏觀調控。但近兩個月來已無類似言論，不易判別其立場是否有轉變。吳官正迄今未曾就宏觀調控一事公開表態。在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之中，多數人未曾表態(王樂泉、王兆國、回良玉、劉雲山、賀國強、郭伯雄、曹剛川、王剛)。曾經表態支持宏觀調控的領導人包括曾培炎(5月17日赴上海、江蘇、天津考察、8月2日赴山東考察、8月13日召開土地管理工作會議)、張立昌(5月18日在天津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張德江(5月19日赴廣東考察)、俞正聲(6月4日在湖北省政協九屆九次常委會議)、吳儀(6月7-10日赴江蘇考察、8月12至15日赴四川考察)、劉淇(8月4日在市民主黨派工商聯領導幹部暑期學習班開班式)。其中曾培炎、吳儀、劉淇曾在7月23日召開政治局後提到宏觀調控，要求「繼續認真貫徹中央宏觀調控決策」。

⁵¹ 2004年7月26日解放軍報報導，江澤民、胡錦濤等人會見出席全軍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經驗交流會代表。江澤民強調，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要緊密聯繫實際，解決問題。當前，特別要在「真」字上下功夫，要真實、真誠。就是要講真話，報實情，不迴避問題，不做「虛功」。江澤民指出，「三個代表」都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而來。這與胡錦濤對「三個代表」的詮釋不大相同。

⁵² 2004年8月23日人民日報報導，胡錦濤在鄧小平誕辰百年紀念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稱讚「鄧小平同志早就主張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並身體力行地帶頭實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利過渡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就中共高層互動分析來說，宏觀理論是指中共菁英政治演變方向（亦即長期趨勢）的整體性解釋。不但要找出幾十年來中共菁英政治演變的歷史軌跡，還要指出造成這種軌跡的動力。研究者掌握長期趨勢及其演變動力之後，據此可以根據演變動力是否改變，預估政局未來的演變方向。倘若研究者對短期趨勢的判斷符合長期趨勢的預估方向，就能加強研究者對短期趨勢研判的信心。若兩者不一致，研究者則需要進一步探討不一致出現的原因——短期趨勢究竟是代表軌跡演變的重大轉折點，或者只是暫時性的小波折，無損於長期趨勢的發展。

舉例來說，十六大之後，許多觀察家認為江澤民大權在握，可以透過上海幫親信在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中發多數影響力，架空胡溫兩人。這種思路是建立在 1980 年代派系政治的基礎上，認為職務權力的重要性遠低於非正式影響力，因此退休領導人可以利用非正式影響力長期干預第一線領導人決策。然而，過去兩年中，外界可以明顯看出胡錦濤的力量正在上升，特別是在非典疫情之後。他一方面掌握部分議題的主導權，⁵³ 另一方面安排自己的人馬（起碼是自己不排斥的人）擔任要職。⁵⁴

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之前，雖然胡錦濤尚未完成鞏固權力的工作，但江澤民的權力已經明顯衰退。從十六大時的以江澤民為主的「一個中心」，衰退成以胡錦濤、江澤民並立的「兩個中心」。江澤民權力的衰退和胡錦濤權力的擴張，不單單受到個別領導人合縱連橫、健康狀況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領導人的權力來源逐漸出現本質性的變化，與 1990 年代初期以前完全不同。這才是兩人勢力的快速消長的主因。

1990 年代中期以後革命元老逐漸凋零，中共領導人的權力來源出現轉變——職務權力的重要性增加，魅力權力的重要性降低。⁵⁵ 革命元老當政期間，中共領導人的主要權力基礎是他們本身在國家歷史發展過程中獲得的威望，如建國革命功勳等。這種權力可稱之為「魅力權力」，是無法轉移到他人的權力。擔任正式的黨政領導職務固然能增加革命老年的影響力，但即使沒有擔任領導職務，他們仍能發揮影響力，甚至推翻現任領導人的決定。

⁵³ 舉例來說，胡錦濤接掌中共中央對台、外事、國家安全、財經等四個領導小組的組長職務。這些職務過去都是江澤民擔任，如今在十六大、十屆人大之後由胡錦濤接任。後者已獲得參與對台、外交、國家安全、財經事務決策的合法性。**中國時報**，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11 版；**成報**（香港），2003 年 5 月 30 日，<http://www.singpao.com/20030530/international/382566.html>；**聯合報**，2003 年 10 月 26 日，第 A13 版；**文匯報**（香港），2003 年 12 月 25 日，http://slave.wwpnews.net/news.phtml?news_id=CH0312250016&cat=002CH&PHPSESSID=a47287f7e669ce7d98938c19857dd5d7。

⁵⁴ 舉例來說，在 2002 年 11 月十六大以前，「團系」幹部擔任省委書記、省長者各為三人。到了 2004 年 4 月時，擔任省委書記的人數增加為 4 人（不包括因病離職的福建省委書記宋德福），擔任省長的人數則增加為 8 人（不包括因 SARS 疫情下臺的原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十六大前擔任省委書記的「團系」幹部是王樂泉（新疆）、宋德福（福建）、錢運錄（貴州）。擔任省長的是李克強（河南）、季允石（江蘇）、馬啓智（寧夏）。目前擔任省委書記的有王樂泉、錢運錄、李克強（河南）、李源潮（江蘇）。擔任省長的是馬啓智、季允石（河北）、李成玉（河南）、楊晶（內蒙古）、黃華華（廣東）、韓正（上海）、楊傳堂（青海）、張寶順（山西）。

⁵⁵ 以下觀點參見寇健文，**中共政治菁英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04**（台北：物難圖書公司，即將出版），第九章第一節。

隨著革命元老的消失，中共領導人的權力來源出現微妙的轉變。⁵⁶ 對江澤民以降的領導人不具有強大的「魅力權力」，因此「職務權力」對他們的重要性逐漸增加。「職務權力」是屬於可轉移的（transferable）權力，喪失某個領導職務便會失去因該職務而取得的資源與權力。由於領導人的權力來源已經改變，1980年代的派系政治不宜做為預估當今中共領導人互動的基礎。擔任重要黨政職務才是當今中共領導人鞏固權力的重要關鍵。

當江澤民把重要黨政職務一個接一個交給胡錦濤之後，前者的權力資源就會逐漸消失，後者的權力資源則不斷增加。基於這個觀點，十六大之後中共高層應該會逐漸從一個中心（江澤民），轉變為兩個中心（江澤民、胡錦濤），再轉變為一個中心（胡錦濤）。由於宏觀理論的推估結果與短期趨勢判斷相符，筆者比較有信心的在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前指出，中共高層互動局勢應該對胡錦濤較為有利，對江澤民則越來越不利。

柒、結論

在訊息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外界如何研究中共高層互動？根據本文的討論，即使資料來源僅限於中共公布的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與活動的報導、照片與影片鏡頭等，研究者仍然可以透過適當的方法找出許多隱藏的線索。對於文字資料來說，研究者必須仔細閱讀內容，找出關鍵辭或是關鍵立場。對於非文字資料來說，則要注意照片、影片鏡頭、「版面語言」隱含的意義。在研究程序上，研究者應該同時採用三種步驟，以求降低資訊不完整帶來的研究障礙。這三種步驟包括個別或少數質性資料的解讀、大量短期資料的編碼分析、依據長期性資料建立宏觀理論。

不過，研究者不能忽略這種方法有其先天的限制。由於僅依賴公開報導，研究者必須隨時提醒自己不要過度推論，得出手中資料無法支持的結論。以江澤民辭去軍委主席為例，本文中談到的資料可以顯示十六屆四中全會前夕，擁胡、擁江兩派歧見已經超出宏觀調控的議題範圍，延伸到意識型態詮釋權以及江澤民在軍中的地位。同時，整體局勢對胡錦濤有利，對江澤民不利。然而，若是僅以這些質性資料就斷言江澤民必然在四中全會辭去軍委主席，就會略嫌武斷。因為還有一部分不明確的重要因素，如胡錦濤是否急於四中全會上接掌軍委主席，也會影響江澤民是否在四中全會上辭去軍委主席職務。

⁵⁶ 套用韋伯（Marx Weber）的觀點來看，中共權力來源的轉變如同「傳統型支配」、「卡理斯瑪支配」的比重降低，「法制型支配」的比重增加。關於韋伯對於這三種支配類型的內涵，見韋伯著，康樂等編譯，**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III）**，修訂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6年）。

附錄

表一：政治局與書記處成員對胡錦濤講話的回應

態度	領導人	言論內容
支持胡錦濤	政治局常委 吳邦國	● 8月22日主持鄧小平同志誕辰100週年紀念大會時說，「我們要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
	政治局常委 李長春	● 8月21日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上說，「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
	政治局委員 書記處書記 賀國強	● 8月21日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開幕式上發言，「…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為重點，…」。 ● 8月22日在中組部召開中心組學習會上說，「胡錦濤同志的重要講話內容豐富、思想深刻，…學習貫徹胡錦濤總書記講話精神，紀念鄧小平同志，最終要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去。」
	政治局委員 曾培炎	● 8月21日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開幕式上發言說，「讓我們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旗幟，…」。
	政治局委員 劉淇	● 8月23日北京市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週年理論研討會上指出，「…要認真學習貫徹胡錦濤總書記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精神，…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旗幟，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
	政治局委員 張立昌	● 8月26日天津市委學習胡錦濤同志重要講話學習班結業式上說，「深入學習貫徹胡錦濤同志重要講話精神，必須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必須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政治局委員 俞正聲	● 8月21日湖北省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一百週年座談會上指出，「…繼承鄧小平同志的遺志，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書記處書記 何勇	● 8月24日中央紀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擴大會上至少四度提到「胡錦濤總書記重要講話」，並且說「我們要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旗幟。」。
支持江澤民	書記處書記 軍委委員 徐才厚	● 8月18日全軍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上指出，「…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牢固確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軍隊建設中的指導地位，進一步增強用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統領軍隊建設和改革的自覺性…」。「…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在新世紀新階段，堅持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就是真正堅持毛澤東軍事思想和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 ● 8月21日在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開幕式上說，「…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開闢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作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軍事篇』…。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同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一定要深刻理解、全面貫徹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
	政治局常委 賈慶林	● 8月24日在全國政協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週年暨鄧小平關於人民政協理論研討會中指出，「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承和發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優良傳統…。」
兩面壓寶	政治局委員 王樂泉	● 8月22日在新疆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一百週年理論研討會上指出，「…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逐步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三次歷史性飛躍。」但他又提到「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不但如此，他把胡錦濤過去提到的重要政治口號與政策全部複述一遍，如「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情為民所繫、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兩個務必」、「提高黨的執政能力」。
	政治局委員 張德江	● 8月23日在廣東省各界紀念鄧小平誕辰100週年座談會上強調，「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承前啟後，繼往開來。」但他也說「我們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並且提到「牢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參加該場座談會的人包括「鄧小平同志視察過的部分地方及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的主要負責同志」，以及「江澤民、胡錦濤同志視察過的部分地方和單位的負責同志」。

資料來源：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04**（台北：五南圖書公司，即將出版）。說明：灰底字為筆者所加，用以凸顯關鍵詞。

表二：解放軍高層對江澤民、胡錦濤地位的反應

態度	領導人	言論內容
支持江澤民	軍委副主席 郭伯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7月26日在全軍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經驗交流會上強調，「要遵循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確立的目標、方針原則和戰略步驟，…自覺堅持黨領導軍隊的一整套原則和制度，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江主席指揮。」 ● 9月12日赴新疆、甘肅部隊調研時指出，「…把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引向深入，努力在『真』字上下功夫，以『真實、真誠』的態度，…要著重學好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確保部隊…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江主席的指揮。」「從嚴治軍是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指導方針。」
	書記處書記 軍委委員 徐才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7月25至26日在全軍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經驗交流會上指出，「深入學習領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著重學好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全軍部隊一定要深刻認識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的重大指導意義。」「最近，江澤民主席對全軍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了重要指示…」。 ● 8月11日在全軍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先進典型報告團首場報告會上說，「這次組織先進典型報告團…是落實軍委江主席『走在前列』的要求、推動全軍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發展的重要舉措，…大家一定要…按照軍委江主席真實、真誠的要求，切實完成…光榮政治任務。」
	軍委委員 梁光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7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軍區部隊調研時強調，「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 ● 7月29日在總參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經驗交流會上強調，「各級要認真學習領會江主席重要指示，以『真』字為著眼點和突破口，…在全面領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時著力抓好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的學習；要認真研讀江主席關於軍事工作和軍隊建設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和講話，深刻領會江主席關於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和軍事鬥爭準備的戰略思想…」。
支持胡錦濤	軍委副主席 曹剛川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7月31日在國防部舉行慶祝解放軍建軍77週年招待會上指出，「牢固確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軍隊建設中的指導地位，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根本制度，「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 9月5日會見解放軍參加第28屆奧運會全體人員時表示，「堅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學習貫徹胡錦濤總書記在會見我國奧運代表團時的重要講話精神，進一步增強為國家和軍隊爭光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動向不夠明確	軍委委員 李繼耐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7月10日在總裝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經驗交流會上強調，「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認真執行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一系列根本原則和制度，…堅定不移地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高度一致。…用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決策指示統一思想，…」【未提到「江主席」】；但他也說「…進一步深化對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的學習…。」 ● 7月26日為太原衛星發射中心發射測試站記一等功慶功會上表示，「…把廣大官兵的思想统一到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決策指示上來，…」【未提到「江主席」】 ● 8月2日在北戴河看望總裝正在休假的人員時，稱讚大家「圓滿完成黨中央、中央軍委賦予的各項任務，…」。【未提到「江主席」】 ● 8月9日召開的總裝傳達貫徹全軍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經驗交流會電視電話會上，他強調「在落實江主席提出的『真』字要求上狠下功夫…，切實把廣大官兵的思想和行動，统一到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江主席的重要指示精神上來。」 ● 8月30日在全軍通用裝備成建制系統形成作戰能力和保障能力建設總結會上指出，「全軍部隊始終堅持以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統攬和指導『兩成兩力』建設，…」。
	軍委委員 廖錫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6月25日在總後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經驗交流會上，沒有提到江澤民及其軍事思想，也沒有提到胡錦濤。 ● 6月27日在濟南戰區大聯勤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始終堅持以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為指導，…要學深悟透江主席關於保障體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論述，…」。 ● 8月12日前往北戴河探視總後集中夏休的人員時，提到「認真學習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精神，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

資料來源：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04**（台北：五南圖書公司，即將出版）。說明：灰底字為筆者所加，用以凸顯關鍵詞。